

人口流动与妇女发展

郑真真 顾宝昌*

1994 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妇女赋权问题和社会性别平等问题，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更将社会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作为 8 个主要发展目标之一。本文基于在中国农村的一项调查结果，讨论人口流动对农村妇女赋权的作用。

最近的十多年间，“赋权”成为一个常用的名词，但对这个名词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项目和行动研究中，赋权适合培养能力相连的，一般是通过接受培训和参与活动达到能力培养的目的。本文则采用 Naila Kabeer 的定义，将赋权理解为具有做出选择的能力，这种选择是以前不曾具有的 (Kabeer, 1999)。本文将把妇女赋权问题与人口流动结合起来讨论。人口流动是近 10 年来中国人口和社会变动的重大事件，其对农村妇女的影响与特定项目不同。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本文将讨论人口流动对妇女的重要抉择、决策能力和发挥期望作用的影响。

本文将利用调查获得的定量和定性信息，通过对曾经有外出打工经历和从未外出妇女的比较，讨论外出打工对农村妇女在男女关系、家庭生活、婚姻生育和生殖健康方面的影响。由于调查是在流出地开展的，因此我们的关注对象是外出后已经回乡的妇女，研究外出经历对她们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就妇女赋权而言，外出经历有显著的影响，但不完全是正面的影响。

一、引言

劳动力迁移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渐成为我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估计，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 7 千万至 8 千万左右，其中 70% 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外出打工热潮，使之成为当地青年必不可少的一种社会经历。1995~2000 年的流动人口规模超过 1 亿，其流动方向和规模如图 1 所示。2000 年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劳动力迁移中妇女约占一半左右，农村青年妇女在其中占了大多数。在如此大规模的迁移流动中，妇女的角色以及她们受到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以往的迁移史中妇女没有独立的位置，她们的迁移活动往往是跟随家庭或丈夫迁移，或者因为出嫁发生迁移。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女性劳动力流动。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女性劳动力流动，妇女流动的规模有时甚至超过男性 (United Nations, 2001)。

* 郑真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顾宝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教授。作者衷心感谢 Ruth Simmons, Rachel Connelly, Max Hendrix, and Laura Ghiron 对本文的评论和建议。本文为 2004 年 8 月提交给“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ICPD+10”背景资料的中文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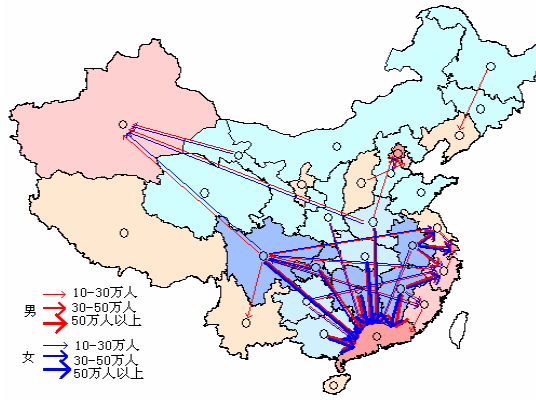


图 1 1995~2000 年省际迁移的主要流量流向

资料来源：蔡昉主编.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6 页

与男性相比，更多 20 多岁的年轻妇女有跨省的流动（见图 2）。她们外出回家后带回了更多的经济收入，并从外面的世界带回了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与此同时，这些外出妇女在外缺乏社会和家庭支持，也经历了更多的风险，因此有时流动妇女成为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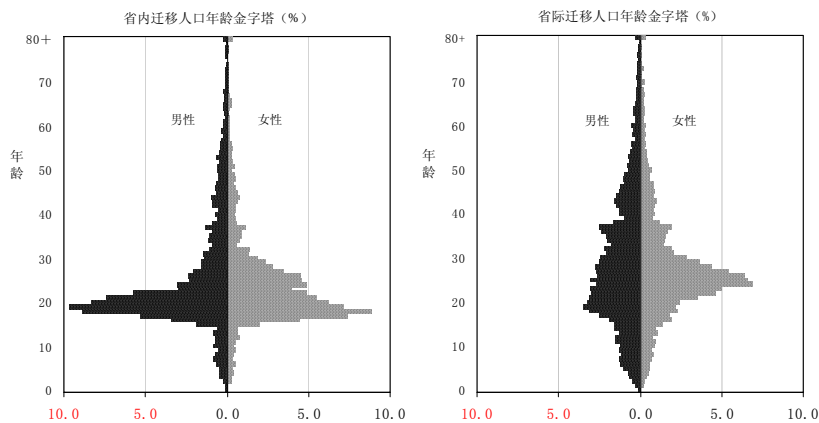


图 2 1995~2000 年迁移人口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蔡昉主编.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7 页

二、 研究背景

为了研究迁移对农村妇女的影响，由中美学者组成的一个研究课题组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 2000 年秋季在安徽和四川农村开展了实地调查。信息收集方法有问卷调查、专题小组座谈和个人访谈。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村的基本情况，妇女本人和家庭的基本情况，妇女外出史，丈夫外出情况，婚姻与生育情况，妇女的生殖健康与避孕节育的情况，以及妇女个人观念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有关信息。与外出有关的信息包括妇女头 5 次和最后一次外出的时间，外出地点（本县、本省外县或外省，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或农村），在外滞留时间，以及有关初次和末次外出的比较详细的情况。在本研究课题中将外出定义为曾经到县城或县城以远的地方滞留 1 个月以上。

调查采用整群抽样方法。2000 年 8-9 月，课题组先后在安徽和四川的 4 个县开展了调查工作。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3186 名 20~40 岁的妇女，其中 1/3 曾经外出。课题组在问卷调查的同时组织了 6 种不同类型的专题小组座谈会 47 次，分别为：曾经外出过的已婚妇女、曾经外出过的未婚妇女、丈夫外出的妇女、从未外出的已婚妇女、从未外出的未婚妇女、曾

经外出的丈夫们。座谈会由课题组成员主持。此外，课题组成员还进行了 50 多户的入户访谈，收集了比较丰富的资料。

由于信息收集对象是当前在农村居住的妇女，因此分析研究对象也就是外出后已经返乡的妇女。从这些调查资料中我们无法判断这些妇女是否与调查时仍然在城市中的农村妇女有差别。不过，因为农村居民难以在城市长期居住，大多妇女终究会回到家乡，因此我们假设本次调查所收集的资料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表 1 为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表 2 为有外出打工经历妇女的初次外出信息。本调查研究更详细全面的分析结果发表在郑真真、解振明主编的“人口流动与农村妇女”一书中（2004）。

表 1 被调查妇女的基本情况

	安徽怀宁	安徽枞阳	四川兴文	四川长宁	合计
平均年龄	30.6	30.5	29.7	29.2	30.0
已婚者比例(%)	97.9	96.5	98.8	98.4	97.9
受教育程度 ¹ (%)					
文盲	21.7	37.1	5.1	4.5	17.0
小学	54.4	44.6	73.4	63.7	59.1
初中	22.3	17.3	19.3	29.6	22.1
高中及以上	1.6	1.0	2.1	2.2	1.8
曾外出者比例(%)	52.8	35.4	26.3	31.2	36.2
目前职业(%)					
家务	11.6	11.6	22.2	13.8	14.8
务农	60.3	74.6	71.0	70.7	69.3
打工	17.3	9.8	2.3	8.3	9.3
个体户	9.0	2.7	3.1	2.9	4.4
其他 ²	1.8	1.3	1.4	4.3	2.2
样本量	760	805	801	820	3186

1 问卷中对所有上过学的调查对象进一步询问是否完成了学业，表中略去了这部分信息。

2 其他职业包括干部、学生、无业等。

表 2 曾经外出妇女的初次外出基本情况

	安徽怀宁	安徽枞阳	四川兴文	四川长宁	总计
人数	401	285	211	256	1153
初次外出平均年龄	23.48	20.94	24.62	24.38	23.26
婚前外出者比例(%)	37.9	58.6	25.1	17.6	36.2
跨省外出比例(%)	88.3	74.3	78.2	75.7	80.2
流入地为大城市*(%)	31.3	20.8	40.8	30.7	30.3
流入地为中小城市(%)	45.0	58.5	36.0	52.4	48.3
平均在外滞留时间(月)	8.67	12.50	14.53	13.69	11.79
外出时主要职业(列百分比)					
无业	3.0	11.9	5.2	4.3	5.3
个体	54.1	6.0	3.3	12.5	23.7
雇员	42.4	81.4	90.5	80.0	69.2
管理者	0.5	0.7	1.0	3.1	1.2
主要工作(列百分比)					
工人	22.9	46.7	64.5	48.6	42.1
餐饮服务	19.2	12.3	12.3	13.7	15.0
零售	49.1	4.6	1.9	8.6	20.5
其他	8.8	36.9	21.3	29.1	22.4

*大城市指直辖市或省会

三、研究主要发现：迁移对妇女生活的影响

有关迁移对妇女的影响历来存在不同的观点 (Hugo, 2000)，在我们组织的座谈会上妇女的叙述显示出外出经历的复杂影响，其中有对自立和成功的喜悦，也有对繁重的工作、缺乏睡眠和恶劣的居住条件的不愉快的回忆。她们在城市中极少享受卫生保健服务，未受保护的性生活时有发生，并导致较多的人工流产，此外还可能面对较高的性病/艾滋病感染风险。尽管如此，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的结果也清楚地显示出，曾经外出的妇女在男女关系和交往方面、独立自主方面有所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她们的家庭和个人生活与从未外出的农村妇女相比有所不同。

本文将集中报告妇女生活的四个重要方面，即对男女关系的看法、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婚姻与生育以及生殖健康和其他健康问题。这几个方面通常是衡量妇女的地位和自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将比较曾经外出和从未外出妇女之间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必要时我们应用了统计检验和多元统计分析，文中所报告的所有差异都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在分析和报告中也应用了定性资料。

1. 对男女关系的看法

多年来，我国的传统社会习惯对男女角色有清楚的界定。妇女的在家庭中是辅助和服从的角色。传统上认为妇女应当从一而终，也不应当与非家庭成员的男性有过密的接触，婚前性行为更是不能容忍的。但是，这些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已经在近 50 年受到了挑战，都市里的年轻人不再遵从传统。不过，在我国的大多数农村地区仍然奉行传统习惯，有些传统已经内化到人们的理念中。因此，在婚外男女关系方面，农村和城市的观念与行为有较明显的差距，且通常被冠以“传统”和“现代”的分类。尽管如此，农村青年仍然具有与传统不一致的个人观点，在座谈会和个人访谈中我们发现，调查对象说出自己在这方面的观点都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更不用说以“现代”生活方式生活了。

曾经外出的妇女在外表和谈吐上显示出与从未外出妇女的不同。在城市中工作的经历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她们的自信心，正如一位农村青年妇女所说：

“要说变化，我的思想变化很大。原来我是个自卑的人，婚姻上也遭受过挫折，他父母不同意。现在我非常自信。我能独立工作，我想将来自己开个公司，因为我对市场很熟悉了。”
(安徽一位 26 岁妇女，初中毕业，有一个女儿)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曾经外出的妇女大多能够比较直率地回答问题，也能够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说”并不意味着必然要“做”。

问卷中有四个问题是关于对男女关系的看法：

- 1) 您认为已婚妇女是否可以单独和男同志交往 (娱乐或出差) ?
- 2) 您是否同意夫妻感情不好就可以离婚?
- 3) 您认为应该向未婚青年提供避孕节育服务吗?
- 4) 你对 “年轻人如果以后结婚，婚前有性行为不算道德问题” 的看法如何?

多元统计分析表明，在控制了个人、丈夫、家庭和调查地点等变量的作用后，对以上多数问题的回答都与妇女是否外出有关 (Connelly, et al, 2003)。

一半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妇女可以和其他男同志一起外出，曾经外出的妇女认为可以比例显著高与从未外出的妇女，而从未外出妇女回答不知道或未回答的比例较高 (见图 3)。同时，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妇女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都与回答“可以”正相关。

我国农村中在离婚的问题上，妻子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和妇女的交谈中，她们解释在农村中离婚往往将妇女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尽管法律明文规定，离婚后妻子有权得到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但按一般农村习惯，女性在离婚时不能分得夫家的财产；无论是因为什

么原因离婚，妇女始终被认为是有过错的一方；另外，还有对离婚后子女问题的担忧。因此，只有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认为只要夫妻感情不好就可以离婚，曾经外出妇女回答“可以”的比例要稍微高一些（见表 3）。因为城市中离婚的现象比农村相对普遍，调查结果中外出和从未外出妇女的差距可能是由于外出妇女受到城市观念的影响，也可能是外出妇女在经济上更为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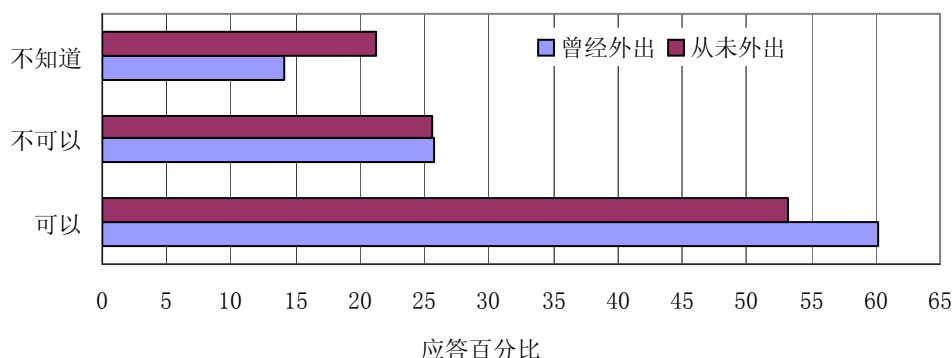


图 3 对妇女是否可以与男同志一起外出的回答

多元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有外出经历的妇女或丈夫曾经外出的妇女对离婚问题有更灵活的看法，生育子女前外出的妇女也更倾向于同意感情不好就可以离婚的观点。

“该离就离，无所谓，只要自己幸福。”（四川一位曾经外出的妇女，23岁，小学，已婚）。

“要离可以，你要包修我（赔偿的意思）”（四川一位曾经外出的妇女，37岁，初中，已婚）。

表 3 不同地区妇女是否外出与对离婚的看法 (%)

	未外出	婚前外出	婚后外出	合计
同意离婚	28.82	33.64	32.16	30.23
尽量不要离婚	47.00	44.16	43.82	45.89
不同意离婚	24.19	22.20	24.02	23.88
合计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合计频数	2030	437	712	3179

向未婚青年提供避孕服务往往被认为是对婚前性行为的纵容甚至鼓励，甚至一些计划生育服务人员都对这个问题持否定态度（崔念等，2001）。因此，我们在问卷设计时将向未婚青年提供避孕服务的看法作为不遵从社会习惯的表现。同时，其他研究也发现外出打工的未婚妇女更有可能发生婚前性行为 and 婚前同居（郑真真等，2001）。本次问卷调查发现，有外出经历的调查对象更倾向于同意向未婚青年提供避孕服务（同意的比例分别为 56.3% 曾经外出妇女和 47.4% 从未外出妇女）。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丈夫曾经外出的妇女更倾向于同意这种观点。在外停留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持同意态度。具有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和较高的家庭收入也和同意态度有正向相关。

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似乎不受外出经历的影响，约 49% 的调查对象认为只要双方准备结婚，发生婚前性行为就不是道德问题。

2. 家庭生活与夫妻关系

从访谈和座谈所获得的信息来看，曾经外出打工的妇女在各方面都有所不同，而这些变化也影响到她们的家庭。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曾经外出打工妇女的家庭拥有更多大件物品，

例如彩电。但是在丈夫外出而妻子未外出的家庭中没有发现这种差异。

问卷调查中设计了 8 个有关家庭决策的问题，即关于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怀孕生孩子、买大件、盖房、送礼、投资或贷款以及妇女外出打工。对家庭中通常由谁决定的选择是：丈夫拿主意、妻子拿主意、老人拿主意和夫妻共同商量。表 4 为调查结果。

表 4 家庭决策与外出经历

家庭决策内容	回答	外出经历	
		外出过	从未外出过
计划生育	丈夫拿主意	11.2	13.3
	妻子拿主意	12.9	10.7
	夫妻共同商量	72.9	73.7
	老人拿主意	1.6	1.0
	不适用	1.5	1.4
怀孕生孩子	丈夫拿主意	6.7	7.6
	妻子拿主意	10.2	10.8
	夫妻共同商量	78.4	77.4
	老人拿主意	1.6	1.0
	不适用	3.1	3.2
孩子教育	丈夫拿主意	14.5	14.6
	妻子拿主意	12.0	12.6
	夫妻共同商量	61.1	66.0
	老人拿主意	1.7	.8
	不适用	10.7	6.0
婚丧年节送礼	丈夫拿主意	11.3	13.7
	妻子拿主意	20.6	20.4
	夫妻共同商量	60.4	61.2
	老人拿主意	7.0	4.0
	不适用	.7	.7
买大件	丈夫拿主意	20.4	21.8
	妻子拿主意	5.0	4.2
	夫妻共同商量	66.1	64.5
	老人拿主意	4.4	2.2
	不适用	4.2	7.2
盖房	丈夫拿主意	15.0	17.0
	妻子拿主意	1.7	1.9
	夫妻共同商量	69.6	66.9
	老人拿主意	5.5	2.9
	不适用	8.2	11.2
投资或贷款	丈夫拿主意	17.7	17.7
	妻子拿主意	2.8	2.1
	夫妻共同商量	52.9	53.4
	老人拿主意	3.8	2.1
	不适用	22.8	24.6
妇女外出工作	丈夫拿主意	10.8	12.0
	妻子拿主意	22.6	16.0
	夫妻共同商量	58.1	47.6
	老人拿主意	1.2	.9
	不适用	7.3	23.4

多数妇女都选择了“夫妻共同商量”，不过，夫妻共同商量的含义有时并不是很清楚，难以判断在商量的过程中妻子是否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见。还有，当丈夫外出时，不少妇女仍然要和丈夫商量。在我们所到过的村基本都有电话。在四川时我们遇到一位到广东打工临时回家的丈夫，因为女儿病了，妻子打电话让他回家。由于具备相互交流的条件和交通的便

利，夫妻一方不在家似乎没有影响共同决策和商议家事。因此共同决策没有受到外出打工的影响。

外出打工和调查对象自报的收入高度相关，曾经外出的妇女收入较高。而个人收入对家庭收入贡献较多的妇女倾向于报告自己更多的参与决策，特别是在关于送礼、买大件、盖房和投资/贷款方面（Connelly, et al., 2003）。我们与外出后回乡妇女的交谈也支持这一发现。例如，有些妇女谈到她们外出打工的动机是给自己盖房。

参与决策的程度也和调查对象的年龄正向相关。在曾经外出的妇女中，她们外出时间越长，参与买大件和妇女是否外出的可能性就越大。与初次外出到小城市的妇女相比，初次外出到大城市的妇女参与决策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丈夫是否外出对曾外出妇女的家庭决策没有显著影响。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多数家长都希望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大约 87%的调查对象认为女孩应当接受较好的教育。是否外出对这一点没有显著影响，但持这种观点与家庭收入相关，有较高家庭收入的妇女更倾向于同意女孩应当接受好的教育，同时高收入与外出经历是相关的。不过我们在入户访谈中了解到，一些家长在机会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是认为应当先让儿子受教育。

表 4 显示只有少数妇女认为家庭中的重大决策是丈夫单独决定的。多数调查对象都认为家庭事务是由夫妻共同商量决定。在计划生育和怀孕生孩子方面这种倾向更为明确；约三分之二的妇女报告在子女教育、送礼、买大件和盖房方面是夫妻共同商量决定。约一半的妇女报告投资或贷款是由夫妻共同决定的。有较多妇女认为自己在怀孕生孩子、送礼和外出工作方面参与决策，丈夫更多在投资或贷款和盖房方面拿主意。是否曾经外出对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只有关于妇女外出的决策是个例外。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从未外出妇女报告她们不参与关于妇女外出的决策。

调查中有三分之一的妇女报告有家庭暴力的情况，但只有少数人说自己经常被丈夫打过。在从未外出、婚后外出和婚前外出三组调查对象中发现有显著的差异（见表 5）。婚前外出的妇女中只有五分之一报告自己曾经被丈夫打过。不过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之后，外出的作用失去了统计上的显著性，中学毕业或受过更高教育和较年轻的妇女较少被丈夫打过。

表 5 是否被丈夫动手打过的回答情况 (%)

	从未外出过	婚后外出	婚前外出	合计
没有	66.2	67.6	80.7	68.3
偶尔有	31.6	30.7	18.7	29.9
经常有	2.2	1.6	.5	1.9
调查对象人数合计	2,015	735	374	3,124

在关于夫妻性生活的观念中，比较普遍认为妻子应当顺从丈夫。我们在调查中遇到一位乡镇官员，他认为妻子不应当向提出丈夫性要求。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多数妇女同意妻子可以拒绝丈夫的性要求，但曾经外出妇女持同意态度的比例相关更高。同样，更高比例的曾经外出妇女认为妻子可以主动向丈夫提出过性生活，而从未外出的妇女对这两个问题“无应答”的比例都比较高（见表 6）。此外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曾经外出过的妇女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更为放松，也愿意和调查员讨论这个话题。一位曾经外出的妇女说，“这不是什么问题，要是我累了就说‘不行’。”

表 6 与丈夫之间的性生活方面的态度 (%)

	从未外出过	婚后外出	婚前外出	合计
您认为妻子是否可以拒绝丈夫的性要求?				
可以	56.7	61.7	68.8	59.3
不可以	19.8	18.4	17.6	19.2
无应答	23.5	19.9	13.6	21.5
您认为妻子是否可以主动提出过性生活?				
可以	52.1	56.4	63.2	54.4
不可以	16.9	17.9	18.7	17.4
无应答	31.0	25.7	18.1	28.2

3. 结婚与生育

晚婚晚育虽然被倡导多年，但基本上仍然只是都市男女的生活方式。我国长期存在初婚年龄和生育子女数量的城乡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部分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不同、子女价值和功能不同，特别是在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方面，城乡观念有很大差异。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就开始了关于流动与生育关系的讨论，但不少讨论是围绕计划生育管理和法规政策的落实问题。我们的研究显示，外出打工对农村妇女的婚育观念有显著影响，部分是因为外出打工限制或改变了妇女的婚育计划，部分原因显然观念的转变。

择偶

对未婚外出的妇女来说，流动显然影响到她们对未来丈夫的选择。有更高比例的曾经外出妇女报告曾经有过一个以上的男朋友（因为她们现在的丈夫不是第一个男朋友）。同样更多曾经婚前外出的妇女说选择丈夫只是她们自己的事。调查结果显示，与从未外出的妇女相比，更多婚后初次外出的妇女她们自己决定和谁结婚，意味着能够外出的妇女可能具有更独立的性格。

按道理说，外出经历为年轻人提供了在更大范围内选择男友的机遇。但我们见到的大部分妇女仍然回到家乡与同县的男性结婚，其中更多是同一个乡的。外出对妇女与外县男子结婚只有微小的影响，在多元分析中迁移的作用并不显著。

初婚年龄

多变量事件史分析结果显示，妇女的外出经历和初次外出时间（即婚前外出还是婚后外出）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作用（郑真真，2002）。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婚前初次外出妇女的初婚年龄有大于其他妇女的趋势。不过因为在农村大部分妇女都是二十岁出头结婚，几组妇女初婚年龄的差距虽然在统计上显著，但绝对差距并不大（见表 7），且婚后初次外出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的与从未外出的妇女。

表 7 已婚调查对象的平均初婚年龄

	频数	平均初婚年龄
从未外出	2,010	21.26
婚后初次外出	736	20.96
婚前初次外出	417	21.91

进一步分析发现，婚前初次外出跨省或流入地为城市的妇女更倾向于较晚结婚。在控制了流入地特征后，初婚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地区以及在外停留时期长短不相关。由于应用了多变量分析，外出者的选择性得到了控制，证明婚前外出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尽管推迟初婚时间并不长，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妇女的自主程度。当然，也不排除推迟结婚有可能是由于条件限制和其他考虑而导致的被动行为。

期望子女数与曾生子女数

三分之二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理想子女数是两个孩子。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曾经外出仍然与较少的期望子女数和较少的实际生育子女数相关（尤丹珍，2004）。表7为按照年龄组、外出与否和调查地区分组的期望子女分布。

表 7 分年龄和外出状况的期望子女数 (%)

年龄	期望子女数	安徽		四川	
		外出过	从未外出	外出过	从未外出
16-24	0	0.9			
	1	50.0	36.7	59.0	41.5
	2	49.1	63.3	41.0	58.5
	N	114	60	83	142
25-29	1	30.4	22.0	40.2	33.6
	2	69.2	77.1	59.8	66.4
	3+	0.4	0.8		
	N	250	236	199	431
30-34	0				1.0
	1	25.7	15.6	32.4	25.1
	2	71.8	81.7	67.6	73.2
	3+	2.4	2.7		0.7
	N	245	410	139	418
35-40	1	24.0	13.4	11.8	26.0
	2	74.7	81.4	85.3	73.2
	3+	1.3	5.2	2.9	0.8
	N	75	172	34	127

外出时间对妇女的曾生子女数有较大影响。生育前外出的妇女与其他妇女相比曾生子女数较少分析结果显示外出的作用在控制了其它变量之后依然显著，说明这种现象不是由于外出妇女的选择性造成的。

外出妇女回到家乡的时间越长，其理想子女数与家乡未外出妇女就越趋近（尤丹珍和郑真真，2002）。这可能是由于趋同效应所致，因为回乡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受到家乡固有观念和文化的影響，或者可能由于在外时间较短，受到城市观念的影响不深。另一种解释可能是这些回乡较早的妇女并不想再次外出（因此回乡时间较长），所以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从未外出妇女的特征更为接近。

根据多元统计分析的结果，外出妇女在外的经历，例如在外从事工作、在外的交往范围以及与家乡的联系等对期望子女数和生育子女数没有显著影响。

图4显示，曾经外出妇女的曾生子女数少于从未外出的妇女。在控制了年龄、初婚年龄和调查地点等变量之后，多变量分析仍然支持这个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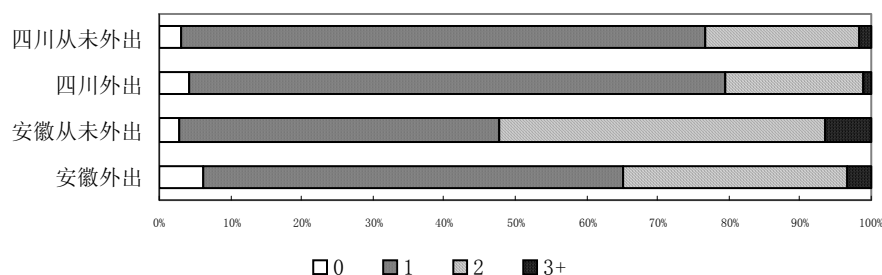


图 4 调查对象的曾生子女数分布

4. 生殖健康

调查对象中大部分是二十多岁的已婚妇女，这个年龄组正是生育高峰¹，因此生殖健康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一。我们的调查主要关注的是避孕和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以及接受生殖健康服务的情况。我国对妇女的生殖健康问题比较重视，已经有多个生殖健康项目在农村地区开展，其中把妇女赋权问题作为项目的目标之一。卫生知识、健康意识和态度、健康行为等都与妇女赋权有关。

避孕

避孕知识通常与妇女的生育经历密切相关，因为多数农村妇女在生育了第一个孩子之后才开始考虑避孕问题。根据计划生育服务规范条例，服务人员在提供避孕服务时应当向用户介绍所有可提供的避孕方法。因此，多数农村妇女报告说她们的避孕知识是从当地计生人员那里获得的（安徽有 60.4%，四川有 73.5%）；获得知识的渠道还有广播电视（安徽 48.7%，四川 54.4%）、报刊杂志（安徽 26.6%，四川 38.4%）、亲戚朋友（安徽 31.4%，四川 26.7%）²。与从未外出的妇女相比，更多曾经外出的妇女从广播电视和报刊杂志上获得避孕知识。更高比例的婚前外出妇女从打工同事那里了解避孕方法。曾经外出的妇女极少报告她们从流入地的计划生育机构获得任何信息和知识，说很多知识都是自己学习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宫内节育器使用率一直在较高水平，2000 年在所有的避孕方法中占 46%³。因此，大约有 96% 的调查对象说她们知道宫内节育器。不过，在外出过和从未外出过的妇女之间有显著的不同。婚前外出的妇女有更多人了解“自我控制”的避孕方法，如口服避孕药、避孕套、外用药、安全期避孕和体外射精，一般来说城市人更多地使用这些方法（表 8）。从未外出的未婚妇女与曾经外出过的未婚妇女相比，她们的避孕知识相对较少。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对象能够正确回答月经周期中最容易怀孕的时间，不过婚前外出的妇女给出正确答案的比例最高。

表 8 未经提示的情况下调查对象能够说出的部分避孕方法(%)

避孕方法	从未外出过	婚后外出	婚前外出	合计
口服避孕药	47.6	56.7	67.5	52.3
避孕套	43.7	49.7	52.0	46.2
外用药	2.5	2.7	5.5	2.9
安全期	5.1	6.3	13.5	6.5
体外射精	3.1	2.9	7.7	3.7

¹ 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5-19, 20-24, 25-29, 30-35, 35-39 岁组的年龄别生育率分别为 5.96, 114.49, 86.19, 28.62, 6.22。

² 知识来源的选项有：乡村的培训讲座、广播电视、书报杂志、亲戚/朋友、打工同事、乡村计生人员、外出所在地计生人员/医生、其他。

³ 中国计划生育年鉴，2001 年。

在曾经外出的妇女中，使用宫内节育器的比例相对较高，服用避孕药的妇女比例也相对较高（表 9）。

表 9 避孕方法的使用 (%)

	安徽				四川			
	从未外出	初育前外出	初育后外出	合计	从未外出	初育前外出	初育后外出	合计
没有采用	6.1	13.3	2.1	7.1	4.2	15.3	1.0	4.8
男性绝育	0.5	0	0	0.3	4.6	0	3.8	4.0
女性绝育	49.2	20.4	51.4	42.6	16.9	4.3	16.6	15.5
宫内节育器	42.0	60.9	44.1	47.0	70.1	76.1	74.7	71.6
避孕药	1.5	2.7	1.7	1.8	0.4	0.6	1.4	0.6
避孕套	0.5	0.8	0.3	0.5	3.3	1.2	1.7	2.8
其他	0.2	1.9	0.3	0.8	0.6	1.2	0.6	0.8
样本量	864	368	286	1518	1139	162	289	1590

对问题“您认为最好的避孕方法是什么”，更多从未外出妇女认为“医务人员控制型”的方法最好，如宫内节育器和绝育，而更多曾经外出的妇女认为能够自己控制的方法最好。

尽管只有少部分调查对象对自己所用避孕方法的副作用有所了解，约有 40% 的妇女在使用避孕节育方法时并不知道该避孕方法会有什么副作用。但婚前外出的妇女了解副作用的比例相对较高。在座谈会上她们提到与同事讨论过避孕副作用的话题。

“我们这般年纪的人一般和结婚的人在一起都没有谈这些问题，回家来已婚妇女讲计划生育问题，我们这些人都不介入，不好意思。在外面打工时别人在谈，我们也有时听一听，因外面的见识和家乡有差别。”（四川妇女，21 岁，初中，未婚）。

从定量、定性材料均了解到，许多妇女在采取避孕节育措施后有一定的副作用，在发生副作用后，安徽有一半以上的妇女采取忍的态度，不去找医生，在四川，妇女寻医的比例较高；在发生副作用后，相当一些丈夫对妇女采取避孕节育措施后的副作用持漠不关心态度；在安徽，外出打工者寻医的比例高于从未外出者，而在四川，外出打工者寻医的比例反而低于从未外出者。

与从未外出的妇女相比，更多外出打工的妇女报告自己曾经有过人工流产的经历。未外出妇女的平均人工流产数为 0.28，而曾经外出妇女的平均人工流产数为 0.37，差别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自我保健和健康服务利用

外出与否与使用卫生巾的比例成正比。外出过的人群使用卫生巾的比例高于从未外出人群，婚前、婚后外出对经期使用卫生用品的影响更大，婚前外出人群使用卫生巾的比例明显高于婚后外出人群。另外，外出人群的卫生习惯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在访谈、座谈中了解到，一些妇女在外出前的洗浴用品与家人是不分开的，外出后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经常清洗阴部，洗浴用品也与家人分开了。一位妇女在访谈中说：“（脸盆、毛巾）以前不是分开的，我跟他们分开了，以前一起用的”。有些妇女说她们在外出回乡后养成了“冲凉”的习惯，在缺水的山区过去是没有这种习惯的。外出过的妇女对日常营养也比较注意。有些妇女提到她们外出回家后注意要吃新鲜蔬菜，如果家里没有就花钱买，而过去很少在这方面花钱。这些变化不仅会对妇女本身的健康有益，也有利于改善整个家庭特别是儿童的健康状况。

四川从未外出过的妇女接受过妇科检查的比例相对高于外出过妇女（许多农村的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服务项目中包括定期妇科检查），但在安徽则相反，从未外出妇女没有接受

过妇科检查的比例最高，这可能与当地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起步早晚有关。婚后外出的妇女参加妇科检查的比例最高。在座谈和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一些工厂为工人妇检提供方便，条件较好的工厂还提供带薪妇检，鼓励妇女参加妇检。

我国在农村地区长期倡导住院分娩，以降低孕产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不少地区的农村妇女仍然偏好在家分娩。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婚前外出过的调查对象报告接生人员是医生的比例最高，意味着她们在医院分娩的可能性最大（见表 11）

表 11 调查对象报告每次分娩的接生人员 (%)

接生人员	从未外出过	婚后外出	婚前外出	合计
计生站/医院医生	27.1	25.7	45.6	28.6
接生员	38.8	34.5	27.1	36.6
接生婆/家里人	26.5	33.4	25.6	28.1
自己	7.5	6.1	1.3	6.6
其他人	0.1	0.2	0.5	0.2
样本量	2,709	967	395	4,071

有关性病和艾滋病的知识

因为我国从 2000 年底才开始兴起全国性的艾滋病预防宣传，而本调查的时间是在 2000 年秋季。总的来说，所有调查对象关于性病和艾滋病的知识都比较缺乏。不过曾经与从未外出过的妇女相比，外出打工的妇女仍然对艾滋病问题知道的更多些。

调查对象的性病/艾滋病知识的主要来源是广播电视；外出过妇女的另一个主要知识来源是街头广告。安徽从未外出妇女获得性病、艾滋病信息的第二重要途径为亲友邻居；外出妇女从书报杂志获得信息相对较多。

问卷中有关于预防艾滋病知识的问题，从回答结果来看，调查对象的有些知识并不确切有时甚至是谬误。多数妇女认为艾滋病只是通过性传播的疾病，不清楚共用针头和母婴传播也时感染艾滋病毒的途径。还有相当一部分调查对象认为与艾滋病毒携带者接吻或共同进餐都会传染。在关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方面，外出过妇女回答正确的比例最高，但是回答错误的比例也相当高。例如，外出过妇女和未外出妇女认为接吻会传染艾滋病的比例分别为 36.4% 和 29.4%，认为与艾滋病毒携带者共餐会传染的比例分别为 23.5% 和 16.3%。对艾滋病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性病离我们很远”，与我们没有关系。不过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妇女已经由于丈夫染病被传染了性病。

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避孕套能够降低传染艾滋病的风险。不过曾经外出与否对该知识没有显著作用。

五、总结与讨论

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们仍将在我国落实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农村妇女的能力增长（或妇女赋权）是关键问题。过去的十多年间，我国大力倡导妇女能力增长，开展了许多旨在提高妇女能力的项目。不过，妇女的能力增长不是独立于社会变革的；同时任何忽视妇女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不能成为全面和均衡的发展。

尽管大部分我国当前发生的大规模迁移多数是短期行为，但是农村到城市的流动毕竟为广大农村妇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为她们的生活和个人事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农村妇女外出打工的结果是拥有了自己挣来的工资和支配权，增加了与外界的联系，能够不受家庭和社区的束缚独立做出重大决定。

本研究发发现农村妇女在劳动力流动的大潮中，通过不同的经历以各种方式使自身的个人

能力得到了增强。外出打工的经历对农村妇女的能力增长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有时是直接作用，有时是通过妇女的经济收入增加起到间接作用。我们的多项分析结果都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外出打工对妇女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尽管存在个人特征的差异，在考虑了这些差异的共同作用后仍然存在外出打工对妇女能力增强方面的显著作用。我们的定性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我们发现外出经历的妇女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思想更为开放，在夫妻关系方面更有自信，态度也不那么“保守”；她们具有更多的生殖健康知识和保健意识，而且倾向于晚婚和少生孩子。

在迁移对妇女能力增长的影响方面仍然存在不同的观点，有关的讨论集中在迁移究竟是妇女能力增长的一种结果还是促进和加速妇女能力增长过程的外部动力，有学者以中国为例，认为来回流动的模式和某些政府条例致使迁移对妇女的作用成为中性或甚至有负面作用(Hugo, 2000)，在对流动人口的选择性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争论。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外出经历对妇女的负面影响；而曾经外出妇女的婚姻自主程度较高，即便是婚后外出的妇女也具有这种倾向，则反映了外出者的选择性。

我们认为，人口流动对妇女的影响超过了任何项目和行政干预的作用，但这种影响不全是正面的。例如外出打工者接受妇科检查的比例较低，还有其他研究所发现的流动人口中由于在流入地缺少及时和相应的服务而出现相对较多的不安全性行为、较多人工流产和较高的性病/艾滋病传染风险，都是迁移对妇女的负面影响。我们访谈的一些妇女在回忆自己的外出打工经历时充满了矛盾的心情。她们为自己的成就和自主感到自豪，但也谈到在外打工时的种种艰辛。

由于我国的劳动力迁移现象还将会持续，它对于妇女的生活和能力增长的影响不可低估。本研究结果提醒注意到劳动力迁移可能对促进妇女能力增长的作用。例如，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组织教育培训以便更有效地提高妇女能力和技能并增进她们的生殖健康知识和增强保健意识。同时应当努力消除对流动妇女不利或歧视的做法。例如政府和相关组织应当关注维护妇女权益、满足她们对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显然流动妇女的需求与男性和城市居民有所不同，她们在某些方面具有更迫切和特殊的需求。生殖健康和保健对育龄流动妇女来说尤其重要。地方的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应当针对流动妇女特别是女青年的特点加以改进，一些城市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已经开始一些针对流动妇女的项目试点，但还远远没有满足需求，政府还应当相应地在这方面加大投入。

此外，还应当重视返乡妇女在农村中的作用，应当鼓励和扶助返乡妇女在农村发展自己的事业。

参考文献

1. 蔡昉、王德文. 2003. 做为市场化的人口流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 (5): 11-19.
2. Cui N, Li M, Gao E. 2001. Views of Chinese parents on the provision of contraception services to unmarried Youth. *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Vol.9 (17): 137-145.
3. Hugo, Graeme. 2000. Migration and women's empowerment. In *Women's Empowerment and Demographic Processes: Moving Beyond Cairo*. Harriet B. Presser and Gita Sen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Lou, Binbin, Zheng, Zhenzhen, Connelly, Rachel and Roberts, Kenneth,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 of Young Women from Four Counties in Sichuan and Anhui." In: *On the Move: Women and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 Arianne M. Gaetano and Tamara Jack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5. Kabeer, Naila. 1999. Resources, agency, 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30: 435-464.
6. 乔晓春. 2003. 从五普数据分析城市外来人口现状. *社会学研究*, (1): 87-94.
7.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2001.
8. Zheng, et al. 2001, Sexual behavior and contraceptive use among unmarried young female migratory workers in 5 Cities of China. *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Vol.9 (17): 118-127.